

国家自然博物馆的“前世今生”

◎本报记者 操秀英

北京中轴线南段，一座国家级博物馆诞生。

6月5日，国家自然博物馆正式揭牌，标志着我国自然博物馆发展历程翻开崭新一页。

国家自然博物馆由北京自然博物馆更名而来。2023年1月，中央编办、北京市委编委正式批复“北京自然博物馆”更名为“国家自然博物馆”。

几代科学家的呼唤和求索终于有了结果。“希望国家自然博物馆藏品越来越丰富，办成世界级一流博物馆。”国家自然博物馆的公众号上的这条留言，正是公众对它的共同期许。

从零开始筹建自然博物馆

人们记忆中的国家自然博物馆各不相同，有人会想到复古建筑前的马门溪龙骨架，有人记忆深刻的是泡在福尔马林中的人体标本，还有人最爱数不清的各式各样的贝壳……但都精彩纷呈。

国家自然博物馆前身最早可追溯到中央自然博物馆筹备处。

1951年3月，经中央宣传部文教委员会批准，中央文化部与中国科学院共同组建了“中央自然博物馆筹备委员会”。次年，“中央自然博物馆筹备处”成立。办公地点设在故宫博物院东华门内的文华殿、传心殿和清史馆，由著名古生物学家裴文中担任主任。在筹备处创建初期，它也和新中国许多新建单位一样，发扬艰苦创业、自力更生的光荣传统，工作人员均从其他文化单位调入，其中包括一批转业军人和新毕业的大学生。

如此大规模的行动，是为了建立一座“中央自然博物馆”，填补全国在这个领域的空白。差不多同一时期，北京天文馆、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也相继筹建和诞生。

如何筹建自然博物馆在那时还是一项陌生课题。国家自然博物馆原副研究员、人类室主任时墨庄回忆，当时西方发达国家的自然博物馆大多已有一二百年历史，馆藏丰富，专业队伍训练有素，陈列场所宽敞明亮，是名副其实的社会教育场所。时墨庄说：“求变心切的博物馆同仁们都认为，我们不能自甘落后地跟在别人后面按部就班。经过大家商议，决定以办展览的方式，在办展过程中积累藏品、培训队伍。”

关于展览内容，大家商定可首先举办一个以“祖国自然环境与矿产资源”为内容的大型展览，以紧密配合祖国的工业建设，充分宣传我国地大物博的自然条件优势。

1954年，中央自然博物馆筹备处的首个展览“全国矿产资源展”便是在故宫文华殿举办的。开展之后，自然博物馆筹备处又连续举办了“治理黄河展”“祖国矿产资源展”等。

1956年，在“向科学进军”的号角声中，中央自然博物馆在天桥动工兴建。这个中

6月6日，“撷英集萃·继往开来——国家自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面向公众开放参观，这是国家自然博物馆挂牌后举办的首个展览，部分珍贵的文字和视频资料是首次与观众见面。

视觉中国供图

央三层、两翼两层的大楼东邻天坛，西对天桥剧场，共8000多平方米，内设14个陈列室和保管室、美工室、演讲厅等。

1958年5月，中央自然博物馆主体建筑落成，由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题写馆名。1959年1月，该馆正式对外开放，这是新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筹建的第一座大型自然历史博物馆。

3年后，中央自然博物馆改名为北京自然博物馆。

标本收藏与科学研究双丰收

1962年，我国恐龙研究第一人、古脊椎动物学奠基者杨钟健院士，荣任国家自然博物馆第一任馆长。

杨馆长上任伊始便称：“我不务虚名，不做挂名馆长，而在博物馆建设方面身体力行、真抓实干。”在他精心调度规划下，国家自然博物馆实现采集、科研、陈列一手抓，着力开展标本库房建设，组建了各生物专业的研究队伍。

随后，国家自然博物馆的几任馆长均由中国科学院院士兼任，他们提倡通过野外采集等方式获得一手资料，致力于推动博物馆的科学研究工作。

例如，为了研究我国新疆境内的塔吉克族的发源历史，国家自然博物馆的科研人员曾5次登上帕米尔高原；“长江流域同样也是中华古文明的摇篮”，这一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广泛关注的论点是在国家自然博物馆的科研人员考察长江、黄河两大流域的众多史前遗址后提出的；从1981年起，国家自然博物馆科研人员通过对柳州白莲洞史前遗址的详尽研究，证实了华南中石器时代文化的真实存在；他们还曾前往当时无人问津的黑龙省赫哲族地区，收集渔猎生产及生活用品，并采集到一批细石器标本和破碎陶片及陶网坠等。野外考察和

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也为创作科普作品和陈列展览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发展，国家自然博物馆在古生物、动物、植物和人类学等地球科学、生命科学领域的标本收藏、科学研究和科普及工作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如今，国家自然博物馆馆藏藏品37万余件，珍稀标本数量在国内自然博物馆中居首位，还收藏有许多珍贵的国礼标本。

以生物进化为主线，国家自然博物馆设有古爬行动物、古哺乳动物、无脊椎动物、神奇的非洲等常设展览，展示了生物多样性以及生物与环境的关系，构筑起地球上生命演化发展的全景图。此外，每年还推出不同主题的临时展览和巡回展览。

最大限度实现开放共享

国家自然博物馆的揭牌，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国家级自然博物馆的建设历来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英、美、法等国都有一个国家级的自然博物馆。因为这是反映国家科学文化水平的主要标志之一，同样是国家形象的代表。

中国地跨寒带、温带、亚热带和热带，兼具古北界和东洋界的动植物区系特征，我国的动植物种类以及化石遗存十分丰富，但此前，我国没有一个全面、系统的自然标本收藏中心用以展示国土自然历史以及自然科学主要学科的知识和研究成果。

1980年，历任国家自然博物馆馆长——裴文中、徐仁、郑作新和周明镇在《大自然》杂志上联名呼吁，一个“国家级自然历史博物馆势在必建”。

此后，多位专家学者呼吁恢复或新建国家级自然博物馆。据有关人士统计，1980年—2001年，在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档案里，有70多位科学界的代表和委员

对重建国家级自然博物馆先后提出过10次议案和提案，继而又由农工党中央就建设新馆问题两次提交提案。

2006年，时任北京自然博物馆馆长李承森提议建设国家自然博物馆，得到科学界的大力支持。匡廷云等26位院士联名上书国务院，发出建设国家级自然博物馆的呼吁。

2019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赵进东再次提交了相关提案，并于年末收到了国家文物局的答复——“积极支持在北京筹建国家自然博物馆，并进行调研、沟通，推进该项工作。”

中国科学院院士许智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分析：“国家自然博物馆的建设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还需要相关部门齐心协力科学规划、打破条条限制、统筹整合各种资源，这件事涉及面广，本身具有难度。”

如今，这一有难度的工作终于顺利推进。北京市委市政府对此高度重视，经过多轮考察、研究、论证，国家自然博物馆建设总体方案最终确定。

国家自然博物馆新址尚在建设中，这座建筑面积约20万平方米、占地面积约5.77公顷的新馆将成为北京大红门地区博物馆群的一颗璀璨明珠，成为未来南中轴线上的标志性建筑。新馆将大幅提升国家自然博物馆服务能力。

在近日举行的2023中关村论坛“科技创新与自然博物馆可持续发展”论坛上，国家自然博物馆馆长孟庆金透露，目前该馆正在开展数字博物馆工程建设，将不断丰富新技术应用场景，更好地发挥社会服务功能。

孟庆金说，自然博物馆不仅要扩大规模，也要注重技术水平、理念的全面提升，数字技术的应用为自然博物馆建设带来了无限可能，“新时代的自然博物馆要和科学、历史、文化、艺术融合，最大限度地实现开放共享。”

科学与艺术：在人类文明的山顶重逢

◎实习记者 骆香茹

当科学遇上艺术，会发生什么？

6月3日，首届“科学与艺术高端对话”沙龙在国家科技传播中心举行。国家一级演员、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孙茜讲起陪孩子看儿童剧时，感受到的科技带来的变化：坐在舞台下的观众抬头看到的“满天繁星”不再是由一个个小灯组成，而是由技术呈现的更生动、更接近现实的“星空”；表现一个孩子想法的变化，舞台背景就出现大脑变化的形象画面。“以前我们在舞台剧中表现角色内心变化的唯一途径就是独白。但如今，科技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改变了艺术创作方法和艺术表现力。”孙茜说。

“科学家是理性思维、逻辑思维占主导，艺术家是形象思维多一些，在一些伟大的科学工程中，光有逻辑思维是不行的，一个科学家只有将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结合，才能成为大家。”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张景安认为，“科学的最高峰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

参与记录、传播“钱学森之问”的张景安回忆道：“钱老说，在创造的最关键时刻，艺术的形象思维能使他不钻牛角尖。而中国就缺乏既懂科学又懂艺术的帅才。实事求是地讲，在科学与艺术的结合上，还有很多文章要做。我们要培养一些既具有科学精神又懂艺术的科学家。”

有不少伟大的科学家钟情艺术。国际欧亚科学院中国科学中心秘书长刘洪海分享了爱因斯坦、钱学森、丘成桐三位在艺术上颇有造诣的科学家的故事。刘洪海介绍说，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丘成桐在描述自己证明了卡拉比猜想的心情时，曾援引晏几道的词——“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丘成桐本人正是科学与艺术完美结合的典范。他不仅攀登数学高峰，屡获奖项，还爱好古典文学，能书善文。

文化涵养科学的同时，科技也正在为艺术的传播与传承贡献力量。

“中国的戏剧有100多年的历史。但许多老艺术家们精湛的艺术表演并没有被留存下来，我们只能通过文字去想象，这是一个遗憾。科技给我们的传承带来了巨大改变。”孙茜说，几年前，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开始利用数字化技术，对老艺术家的艺术创作和艺术心得进行留存和传承。

“我们过去都是一对一传心授，老教师教一句，学生学一句。”国家京剧院一级演员、梅兰芳金奖大赛金奖获得者江其虎表示，“戏曲与科技的碰撞融合给当代戏曲传播带来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戏曲传播与科技的进步密不可分，高度依赖口传心授的戏曲行业现在正借助科技，抢救老艺术家身上的‘四功（唱、念、做、打）五法（手、眼、身、法、步）’。”

江其虎介绍，近年来，国家京剧院运用技术，传承经典名剧《龙凤呈祥》，创新升级推动了元演播产业发展，各方联手打造了“5G京剧元宇宙”，融合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展现了传统艺术的勃勃生机，拓展了艺术传播的新局面。

要让科学与艺术融合，学校教育也是关键一环。“我们要使科学与艺术融合教育为建设科技强国、培养创新人才的目标服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卡林加科普奖获得者、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学会名誉理事长李象益表示，为了推进科学与艺术融合教育的发展，要开展启迪好奇心、培育想象力、激发创造力的教育，同时要开展跨学科、综合性教育。

“当科学遇见艺术”似乎是一个老话题，但其实我觉得并不过时。在新时代，它们依然像过去那样形影不离、相互为伴、密不可分。艺术一旦插上了科学的翅膀就会变得超乎想象的绚丽多彩。科学一旦植入艺术的细胞，会变得难以置信的神奇浪漫。”中国科技新闻学会科技传播力促进工作委员会主任陈泉涌在活动上表示。

一位外国作家曾经说过，科学和艺术一开始是在一起的，它们让人类摆脱了愚昧，走向了文明。它们在路途走着走着，就在一个山路上分手了，现在又在山顶汇合了。”中国科技新闻学会科技传播力促进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金振蓉说，“在文明程度不断提高的时候，科学和艺术一定会走向融合。”

《青春之城》：讲述创业故事，展现创新精神

◎尹洪玉

电视剧《青春之城》近日收官。这部电视剧由广东省委宣传部、深圳市委宣传部等联合出品，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档播出，并于腾讯视频、爱奇艺视频平台同步播出。该剧一经播出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大众与媒体的广泛关注。《青春之城》从科技创新的视角出发，以粤港澳大湾区主要城市为故事背景，以科技创业者在电力、人工智能等科技领域的奋斗历程为叙事主线，讲述了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背景下科技创业者深圳逐梦的创业故事，生动反映了粤港澳大湾区蓬勃发展的美好图景以及我国在科技产业领域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

作为一部主旋律题材的都市创业剧，该剧以科技创业为核心，塑造了大湾区的人文精神。在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战略推动下，《青春之城》聚焦于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技创业故事，借助人物的命运沉浮与科技创业故事展开对“共建人文湾区、弘扬科技创新”主题的表达，同时凝结了科技创业者自立自强的创业精神与家国情怀，增强了主题内涵的思想厚度、情感温度与艺术高度。

在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推动下，该剧以科技创业为叙事主线，塑造了一批敢为人先的新时代青年创业者群像。剧中科技追梦人方远舰是中生代智能科技创业代表，在我国智能技术遭遇外国公司技术封锁的情况下，他毅然回到母校深圳大学，与企业合作研发人工智能，最终成功制造出中国智能双足人形机器人，展现了创业者的创新精神。企业家夏末坚持自主研发，培养科技人才，最终攻克技术难关，实现了技术的革新与企业的转型，展现出了坚定的理想信念与自强不息的创业精神。基层公务员蒋楠楠凭借智慧与谋略，为科技创业者排忧解难。

该剧将创业者的理想信念、创业精神、使命情怀与国家发展紧密相连，以创业者的科技创新故事来展现粤港澳大湾区繁荣发展的主题，通过科技创业者的奋斗史，折射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与粤港澳大湾区多元文化的发展，也印证了深圳“梦想之都”的称号。（作者单位：澳门科技大学电影学院）

中国植物学先驱的璀璨人生

◎实习记者 朱玺

北京西郊，国家植物园樱桃沟。在这幽静的一隅坐落着一座亭子，名为“水杉亭”。亭旁有座石碑，上面刻着一首古体诗《水杉歌》，洋洋洒洒、气势磅礴。这首诗的作者就是一手创建了中国植物分类学的著名植物学家胡先骕。

胡先骕，生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江西新建人。1912年，胡先骕被江西省官派至美国加州大学留学。留学期间他看到西方科学发达，深感只有发展科学、推动实业才能使中国变得强大。其间他还结识了怀揣同样理想的留美中国学生秉志、任鸿隽等人，并于1915年加入了刚刚创建的中国科学社，踏上了科学救国的道路。1916年胡先骕学成回国，后来二次赴美并于1925年取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之后，胡先骕便成就了一番大事业。

志存高远 脚踏实地

胡先骕是一个卓有成就的植物学家。他是第一个命名植物新属（秤锤树属）和新科（鞘柄木科）的中国人。他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中国植物志属》中首次系统梳理了中国的植物谱系，为后续几十年的中国植物研究打下了基础。1948年，他与郑万钧鉴定命名了被学界认为灭绝已久的“活化石”水杉，轰动世界。而水杉叶子现已成为国家植物园标志的一部分。

而比个人的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胡先

骕创建了中国植物学体系的各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与动物学家秉志创建了国立东南大学第一个生物系——国立东南大学生物系，中国第一个生物研究所——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中国最有成就的生物研究机构”——静生生物调查所（今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牵头发起了中国植物学会、庐山森林植物园（今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今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此外，他还创办了好几个生物学专业期刊，编写了3部大学植物学教科书，亲手培养了大批植物学人才，使中国的植物学事业很快登上世界舞台。胡先骕还校订了几代中国植物学教科书，使得植物学知识成为中国人基础教育的一部分。几十年的科学生涯中，始终不变的是他“科学救国”的初心。

胡先骕之所以能得到国内外学界的认可，在于他敬畏科学，怀揣一丝不苟、求真务实的态度。2016年，卢开运著、胡先骕审校的《高等植物分类学》修订稿在旧书市场上被发现。全稿388页，胡先骕的批注修改多达700余处，删节120处，提出疑问15处，修改图注8处。然而后来在为此书作序时，他仅褒奖作者“用功甚勤”，未提及自己的批改勘误。

学贯中西 文理兼通

在建立耀眼科学成就的同时，胡先骕还是一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绕不开的人物，这也是他与同时代科学家最大的不同之处。清末民初时，面对现代西方文化与传统中国文明的碰撞，胡先骕这一代青年人持有两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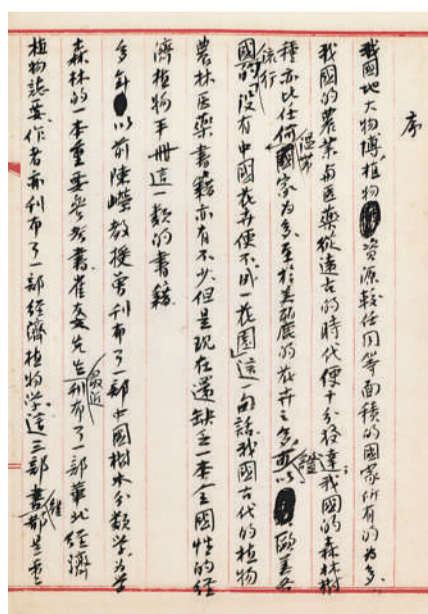
上图 胡先骕在哈佛大学期间的留影。

右图 《经济植物手册·序言》手稿。

胡先骕家人供图

不同的观点。一类是以胡适、陈独秀等为代表的“激进派”，主张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彻底的革新；另一类是以胡先骕为代表的“改良派”，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其内在的价值，应该通过改良使之与现代社会和科学相适应。1921年，胡先骕与刘伯明、吴宓、梅光迪创办了《学衡》杂志，发表了大量文学批评文章，形成了维护传统文化的“学衡派”思潮。胡先骕这个时期撰写的一批文学批评文章，一改中国传统文论的风格，被认为开创了现代文学批评的先河，因而在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

胡先骕是中国古代诗歌的热烈倡导者和实践者。他一生写古体诗词，成为民国诗坛的重要人物。作家汤海若认为：“胡先骕的文学作品，在整个民国文坛都可以称得上是出类拔萃的。”他的诗后来由钱钟书



编辑为《仟庵诗稿》。他还将传统文学与现代科学相结合，创作了多篇科学题材的古体诗，其中最著名的当属科学长诗《水杉歌》。《水杉歌》描写古代地球板块的迁移，讲述古老物种的灭绝以及今日水杉的重新繁盛，兼具文学性和科学性。

“琅函宝笈正问世，东风吹看压西风。”《水杉歌》中的最后一句反映了胡先骕的大家风范。为了让后人了解和铭记这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2023年5月，《胡先骕全集》（19卷）由江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收录胡先骕生前撰写的论文、著作、译著、诗词、书信等。胡先骕后人、《胡先骕全集》主编、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胡晓江表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希望胡先骕的精神能够激励年轻一代，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笃定前行。”